

## 清华简《蟋蟀》再议

黄 效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耆夜》的简文用语和其所记本事之间的历史语境是非常契合的。而简文中《蟋蟀》这一乐歌的本事相较《唐风·蟋蟀》而言也显得较为合理,其主旨思想和周初周公的思想也比较相符。今本《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标题、乐调、语言、句式、思想和题材上都广泛存在着继承和相互借鉴的习惯。考虑到简本《蟋蟀》与《唐风·蟋蟀》在标题、语言、句式、题材和思想上存在极大相似性,故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源与流的关系。先秦时期,文本的生成往往需要经历十分漫长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段,受不同的环境影响,其文本所呈现出的状态也是十分不同的,这点从其他出土文献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故无论是放在今本《诗经》中广泛存在的继承与相互借鉴的习惯中考虑,还是放在先秦文献的生成与传播的大背景下考虑,简本《蟋蟀》与《唐风·蟋蟀》都应该被视为源与流的关系。

**关键词:**《蟋蟀》;歌、诗联系;历史语境;源流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20)02-0075-07

###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Qinghua's Bamboo Script of *Cricket*

HUANG Xi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between words in the bamboo script and its real fact recorded in *Qi Ye* is credible. The bamboo script of *Cricket* is also more reasonable than that of *Tang Feng's Cricket*, and its main idea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ZHOU Gong's though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Zhou Dynasty. Many chapters in *The Book of Songs* are not written overnight. Instead, there is a widespread habit of inheritance and mutual reference in titles, tunes, language, sentence patterns, thoughts, and subjects.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great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bamboo script of *Cricket* and *Tang Feng's Cricket* in the titles, languages, sentence patterns, themes, and thoughts, th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should 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rce and flow.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the generation of texts often required a very long process,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we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he state of its text is very different, which can also be confirmed from other unearthed documents. Accordingly, whether it is considered in the widely existing inheritance and mutual learning habits in the present *The Book of Songs*, or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Pre-Qin literature, the bamboo script of *Cricket* and *Tang Feng's Cricket*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rce and flow.

**Key words:** *Cricket*; songs and poetry connection; historical context; source relationship

今年是简本《蟋蟀》面世的第十个年头。十年过去了,关于两首《蟋蟀》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可以

收稿日期:2019-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诸子综合研究”(编号:15ZDB007)

作者简介:黄 效(1989-),男,广西平南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研究。

说,对于简本《蟋蟀》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与今本《蟋蟀》的关系问题,目前学界依然没有共识。下面笔者将不避浅陋,对这些问题进行回顾,并提供一些新的论证视角。

## 一、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根据以往的研究历程,关于简本《蟋蟀》及相关问题的争论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2009年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发文,初步介绍简本《蟋蟀》的情况开始,这个阶段大概以2009年—2011年为限,这段时间的争论只是牵涉到个别学者,争论的程度还不是十分强烈。

2009年8月3日,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清华简〈郕夜〉》一文,简单地介绍了清华简《郕夜》中《蟋蟀》一诗的创作及流传情况,并对它作了一些“揣想”。对于今本《蟋蟀》和简本《蟋蟀》的关系,他认为“(简本)《蟋蟀》系戡耆(黎)时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竟成为当地的诗歌了。”显然,在李学勤先生眼里,简本《蟋蟀》和今本《蟋蟀》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李学勤先生对简文中称《蟋蟀》一诗为周公即兴创作的说法并不怀疑,并认为它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耽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sup>[1]</sup>随后,孙飞燕也持类似观点。<sup>[2]</sup>但是,这一观点并未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于是围绕着简本《蟋蟀》的作者、主旨及其与今本的关系等问题,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刘成群率先提出质疑,他认为李学勤先生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sup>①</sup>接着,陈致从音韵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这几首诗不太可能是商周之际原来的作品。<sup>[3]</sup>为了回应质疑,李学勤先生在2011年再度发文,对原来的观点做了更为详细、清晰的论述。<sup>[4]</sup>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纷纷就此发表看法,是为争论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为2011年迄今,其特点是范围更大、程度更热烈。

首先,是支持和类似李学勤先生的观点。程浩认为简本《蟋蟀》与今本《蟋蟀》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同一首诗。<sup>[5]</sup>吴新勇认为,《蟋蟀》一诗传入唐地大概有两种途径。<sup>[6]</sup>陈民镇认为简文所谓周公作《蟋蟀》的本事具有合理性。<sup>[7]</sup>黄怀信认为简本《蟋蟀》应属《书》学系统而《唐风·蟋蟀》被人加工过。<sup>[8]</sup>高华平先生在肯定了李学勤先生的说法后进一步认为“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则应该是流传于楚地的未曾经孔子‘删定’的《蟋蟀》文本(或者是虽曾经过孔子‘删定’,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仍可能存在的《蟋蟀》‘异本’)。”<sup>[9]</sup>除此之外,李均明<sup>[10]</sup>、秦云霞<sup>[11]</sup>、段颖龙<sup>[12]</sup>等也持与李学勤先生类似的看法。其次,是反对李学勤先生的观点。刘光胜认为“作”字应理解为演奏,因此不能断定周公是《蟋蟀》的作者。<sup>[13]</sup>曹建国则认为简本《蟋蟀》是战国人仿《唐风·蟋蟀》而托名周公的作品。<sup>[14]</sup>姜广辉则从乐调的特色出发,认为简本《蟋蟀》绝无可能是周公所作。<sup>[15]</sup>此外,周宝宏虽然反对姜广辉等人的观点,但他也认为简本《蟋蟀》不是周公所作。<sup>[16]</sup>除此之外,学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比如李锐认为考求两者早晚优劣,意义不大。<sup>[17]</sup>张三夕、邓凯认为它们可能属于“同题创作”,<sup>[18]</sup>等等。

由此可知,关于清华简《蟋蟀》与《唐风·蟋蟀》的争论,其实质涉及《郕夜》文本的真伪,《蟋蟀》的产生、接受和流变等一系列的问题。故笔者认为,要解决以上种种问题,就必须把它们放到更广泛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审视和辨别。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去理解和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及揭示背后蕴藏的历史现象和规律。

## 二、简本《蟋蟀》应为周初时所作

对于《耆夜》一文的成书问题,学界曾有过种种质疑。其中,姜广辉通过考证“颙颙戎服”“祝诵”“明明上帝,临下之光”等词句的出现时代,认为《耆夜》一文实为伪作。<sup>[15]</sup>姜文一出,便遭到了一些学者反驳。<sup>[16]</sup>随后,通过与姜文类似的方法,一些学者认为《耆夜》一文的成书当在西周中晚期。<sup>[13]</sup>笔者认为,以上提出质疑的诸君,在方法上存在非常大的局限。

我们虽然承认语言的发展和时代、思想等因素息息相关,但是在先秦文献已经大量失传和面目全非的情况下,仅靠有限的语料作为对比,就认定某个文献是真或伪的做法是存在非常大风险的。况且,先秦文献中出现的每一个词语都会重复出现吗?显然不可能。而且一些学者在语料的搜集上也存在问

① 详情参见刘成群《清华简〈郕夜·蟋蟀〉诗献疑》,《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第146—149页。刘成群《清华简〈郕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东岳论丛》2010年第4期,第57—62页。

题。譬如对于简文中出现的“万寿无疆”一词,有学者依据一些金文就认为它的出现当在西周晚期。<sup>[13]</sup>但据笔者统计,“万寿无疆”一词在《诗经》中实已出现了6次之多,分别出自《七月》《天保》《南山有台》《楚茨》《信南山》《甫田》等篇。这六篇之中,除《七月》来自《豳风》外,其余五篇皆来自《小雅》,都大概为西周中期的作品。按《七月》一诗,《毛序》认为是周公所作,后经崔述考证,虽不认同《毛序》说,但认为成诗应在周公之前。<sup>[19](p435)</sup>故“万寿无疆”一语,实为早已有之,不必到西周中晚期。其实,除了“万寿无疆”之外,《诗经》中关于“万”字的词语也很多,如“万舞”(见《简兮》);“万年”(见《信南山》《鸛鸣》等篇);“万寿无期”(见《南山有台》);“万福攸同”(见《采芣》《蓼萧》);“万邦为宪”(见《六月》);“万寿攸酢”(见《楚茨》);“万福来求”“万邦之屏”(见《桑扈》);“君子万年”(见《鸳鸯》);“万民所望”(见《都人士》);“万邦作孚”(见《文王》)等等,不一而足。如此之多与“万”字有关词语的出现,足以证明时人对“万”字的情有独钟。如果进一步观察它们的特点,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多与祝语有关,这与周之前巫祝文化的发达有关。所以,“万寿无疆”一词在西周中期之前可能已经非常流行了,至于它的出现时间,则可能要早得多,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周初。

其次,《耆夜》一文的选词用语非常精准,和当时的历史语境非常契合。在《耆夜》一文中,曾多次出现作“诗”的情景描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简文中从来没有说现场所作的是“诗”,而是说“作诃(歌)一终”。“作歌一终”的说法在《吕氏春秋·音初》中曾出现,其文谓:“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sup>[20](p141-142)</sup>按照《吕氏春秋》的描述,这里“作歌一终”的“歌”当为原始歌谣,有学者认为这是“作诗一章”,<sup>[21]</sup>则差矣。

所以,从本质上而言,《耆夜》一文中所有“佚诗”,只能称作“佚歌”,不能说是“诗”,简本《蟋蟀》也是如此。又由于那时正是“诗”观念的形成时期,故用“诗”字或“歌”字来描述场景,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涉及对历史场景的真实把握和精准描述。关于“诗”观念的产生及其与“歌”的联系和区别,高华平先生认为:

具体到“诗”“歌”二字而言,甲骨文中既无“诗”,也无“寺”“峙”“持”等,只有写作“歌”的“歌”;西周和春秋时的金文中仍无“诗”字,但已有“寺”“峙”和“诃”字……所以,如果从文学观念的角度来看,……在殷商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尚没有“诗”的概念,也就不可能有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的“诗”;有的只是作为音乐的“歌”(“歌”),“诗”是作为一种人们还不能意识到的因子而蕴含于“歌”(“歌”)中的。<sup>[22]</sup>

由此可知,西周时期虽无“诗”字,但已经出现了专门表达“诗”观念的文字“寺”和“峙”,假如简文中周公作的是“诗”,就应该用“峙”字来表达,这样用字才符合历史语境。但由简文中宴会庆祝的场景以及用词来看,周公所作的应该是以歌词为主的歌谣而不是诗,故简文称之为“作诃(歌)一终”,而非作“诗”一首。又由于甲骨文中并没有“诗”字,也无“寺”“峙”“持”等字出现,只有写作“歌”的“歌”,而直到西周和战国时期才有“寺”“峙”和“诃”等字出现,故“诗”观念的产生最早可能在商周之际。周公作为由商入周的人物,其所作的只能是“诃”或“峙”,而简本恰恰用了“诃”字。简文《耆夜》不可能是周公所作,而可能是西周史官所记,所以用“诃”字不仅精准地体现了简本《蟋蟀》作为宴会歌谣的性质,也体现了当时人们“诗”与“歌”的观念。故简文在用字造句上,是非常符合商周之际的历史语境的。

再次,就简文中《蟋蟀》一诗的本事、思想而言,它和当时的情境也是非常契合的。李学勤先生曾注意到“《西伯戡黎》的本事……从各方面考虑,要比传统的说法近乎情理”。<sup>[4]</sup>按照李学勤先生根据出土材料的考证,如果把《耆夜》中有关记载作为《蟋蟀》一诗的本事,则要比《诗序》中把讽刺晋僖公“俭不中礼”作为本事显得合理。笔者认为,如果从简本《蟋蟀》一诗的主旨思想上看,李学勤先生的说法也是成立的。

对于简本《蟋蟀》的主旨思想,李学勤先生认为它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耽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sup>[1]</sup>《孔子诗论》:“孔子曰:《蟋蟀》智难。”<sup>[23](p157)</sup>或也是针对此诗而发,这点学界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今本《蟋蟀》的主旨情况就不一样。《毛诗序》曰:“《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sup>[24](p361)</sup>显然,在《序》的作者眼里,今本《蟋蟀》的作者是要劝人依据礼义进行适度的享受,不可太节俭。朱熹《诗集传》:“唐俗勤俭,故其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及其岁晚务闲之时,乃敢相与燕饮为乐。而言今蟋蟀在堂,而岁忽已晚矣。当此之时而不为乐,则日月将舍我

而去矣。然其忧深而思远也,故方燕乐而又遽相戒曰:今虽不可以不为乐,然不已过于乐乎?盖亦顾念其职之所居者,使其虽好乐而无荒,若彼良士长虑却顾焉,则可以不至于危亡也。”<sup>[25](p68)</sup>方玉润认为《蟋蟀》的作者:“其人素本勤俭,强作旷达,而又不肯过放其怀,恐耽逸乐,致荒本业。故方以日月之舍我而逝不复回者为乐不可缓,又更以职业之当修勿忘其本业者为志不可荒。”<sup>[26](p252)</sup>钱锺书《管锥编》认为:“按虽每章皆申‘好乐无荒’之戒,而宗旨归于及时行乐。”<sup>[27](p234)</sup>高亨认为:“这是统治阶级的作品,宣扬人生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又自警不要享乐太过,以免自取灭亡。”<sup>[28](p150)</sup>笔者按,《序》谓今本《蟋蟀》为刺晋僖公所作,清人方玉润谓:“今观诗意,无所谓‘刺’,亦无所谓‘俭不中礼’,安见其必为僖公发哉?《序》好附会,而又无理,往往如是,断不可从。”<sup>[26](p253)</sup>李学勤先生根据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铭文记载,得出结论为“不难看出晋僖公绝不是俭啬之人,而是耽于逸乐,爱好田游和美味的豪奢贵族。《诗序》所讲恐怕不是史实。”<sup>[4]</sup>今观《唐风·蟋蟀》,其中间既要劝人及时行乐,其末尾又要求不能过度行乐,实际上是提倡一种适度享受的思想,主张依据礼义有节制地行乐,故钱氏与高氏的“及时行乐”一说并不准确。

如果我们详细分析两者的主旨思想,可能就会发现其中巨大的差异。在上文中我们提到,简本《蟋蟀》的主旨思想就是“诫惧”。而“诫惧”的思想其实和周初时期周公的思想是非常吻合的。《史记·周本纪》:“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我未定天保,何暇寐!’”<sup>[29](p165)</sup>由此可见,岐周虽已代商,但周初的政权非常不稳定,对此周初的统治者们也是十分担忧,武王夜不能寐就是明证。武王去世后不久,就爆发了管蔡之乱,周公作为摄政大臣,虽然平定了战乱,但此时他的心境,恐不能有丝毫松动,《康诰》曰:

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sup>[30](p210)</sup>

上述材料中出现了“惟命不于常”的观念,对此陈来先生认为:“这是周公一反传统天命观而提出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强烈地体现出周人在克殷之初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对周公而言,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是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以后面对混乱局面的政治焦虑。”<sup>[31](p188)</sup>应该说,这种焦虑和忧患是深刻且强烈的,故简本《蟋蟀》虽然是战胜归来的宴会之词,但面对着动荡不安的局面,恐怕也不得不有着强烈的“诫惧”意识和“知难”意识。所以,简本《蟋蟀》的主旨肯定会有别于依据礼义提倡适度享乐的今本《蟋蟀》的主旨。

最后,一些学者还认为即兴创作难度太大,似乎不太可能,故《蟋蟀》的作者不能认为是周公。<sup>①</sup>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说《耆夜》一文中所载之乐歌全为即兴创作,或有点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关于《蟋蟀》的创作,《耆夜》中特别指出了是周公看到蟋蟀入室后有感而发的,而对于其他乐歌,都没有类似的记述。故实际上,可能只有《蟋蟀》一首乐歌存在是否为即兴所作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只是即兴创作一首乐歌,这对于周公和当时的文化精英来说或许不是难事。后世文人在相聚之时,经常玩“曲水流觞”的游戏,即把酒杯放在一个不算太长的弯弯曲曲的水道上,酒杯流到谁面前,谁就取下来喝酒,同时还要赋诗一首,以显示自己才思敏捷,宋代闻名于世《兰亭雅集》就是如此产生的。由《耆夜》一文浓厚的作歌氛围可知,作歌一事在当时实为时尚,故文化精英对作歌的技巧必然十分娴熟。如果说顷刻之间作出一歌,似无可能,这点《耆夜》的作者或有所美化,但如果说要在一个宴会那么长的时间创作不出一首篇幅不算太长、语意多为重复的乐歌来,这实是对古人智慧的低估。根据宋代兰亭雅集典故的情形,宴会上所有乐歌都是即兴创作都是有可能的,并非不可能。故简本《蟋蟀》的作者,非常有可能是周公。但同时我们承认,《耆夜》的作者或许对此事有一定的美化。

故,无论是从《耆夜》一文的选词用语、历史语境,还是从简本《蟋蟀》的本事、主旨思想和相关可能性看,《耆夜》一文都应该是可信性非常高的文献,其成文或在西周早期。至于《蟋蟀》的作者,亦非常有可能是周公。

① 刘光胜《清华简〈耆夜〉考论》认为:“清华简《耆夜》武王、周公所赋乐诗,实际是武王、周公选定,由乐官提前配以乐曲、编辑好的,……武王、周公届时吟唱、演奏而已,……并非即兴创作。”

① 详情参见赵敏俐《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从〈诗经〉到元曲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赵敏俐认为：“最初的乐歌是依诗配乐的，一旦定型之后就成为固定的曲调，……《诗经》的乐歌中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类明显的例证，但是却有许多同题之作，……以往人们往往认为它们仅仅是采用了相同的比兴手法，其实，古老的手法往往源于同一首古老的歌谣，它们虽然还没有形成典范的法式，在各地还会形成不同的变体，但是还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乐歌的传统在起作用。”

| 清华简《蟋蟀》                 | 《唐风·蟋蟀》        | 《诗经》中其它类似句式      |
|-------------------------|----------------|------------------|
| 毋已大乐;毋已大康;毋已大康          | 无已大康;无已大康;无已大康 |                  |
| 康乐而毋忘(共3句)              | 好乐无荒(共3句)      |                  |
| 是惟良士之方方;是惟良士之思思;是惟良士之思思 | 良士瞿瞿;良士蹶蹶;良士休休 |                  |
| 岁聿云莫;岁聿□□               | 岁聿其莫;岁聿其逝      | 岁聿云莫(《小明》共2句)。   |
| 日月其迈,从朝及夕               | 日月其除;日月其迈;日月其悒 | 日月方除;日月方奥(《小明》)。 |

按,简本《蟋蟀》全诗共40句,除去残缺8句,可知32句。《唐风·蟋蟀》全诗共24句,由上述表格的对比可知,简本《蟋蟀》有21句(包括残缺2句)分别和今本《蟋蟀》21句意思相近。今本《蟋蟀》仅“职思其居”“职思其外”“职思其忧”这三句在简本中没有对应的句子。仅就句式而言,除去残缺中未可推知的部分,简本就有17句分别和今本18句相似,甚至在语法结构上完全相同。这么大的相似率,如果说两者在节拍韵律上完全没有关系,则恐怕不能令人信服。结合上表中这两首《蟋蟀》和《诗经》的其他作品相比,也存在大量的相似性。比如简本《蟋蟀》中首章只改变末尾一个字的引起方式,《诗经》中就有3首与之相似。而如今本《蟋蟀》的引起方式,《诗经》就有1首与之类似;如果用一字不变的引起方式来衡量,那么类同的就更多。而类似于简本《蟋蟀》中“不喜不乐”的句式,《诗经》中就有多达22处,32句,因此完全可以说这是《诗经》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用语习惯。由上述表格可知,《诗经》中的作品存在许多相互类似的句式,这当是由于当时的语言习惯和它们之间相互借鉴与继承而造成的。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简本《蟋蟀》与今本《蟋蟀》的相似性那么高,故简本《蟋蟀》与今本《蟋蟀》在曲调、语言、题材和文本形式上,都极有可能存在联系。

据上可知,简本《蟋蟀》与《唐风·蟋蟀》不仅题目相同,而且句式、语言、语意、题材等也存在极大的类似性,结合以上黄侃、赵敏俐、李炳海等诸先生对《诗经》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测,两者之间是非常可能存在一个传承与借鉴关系的。而这两者之间,简本《蟋蟀》的语言显然要比《唐风·蟋蟀》更为口语化,《唐风·蟋蟀》在文本上显然要更整饬,当经过后人的整理。高华平先生就认为简本《蟋蟀》是未经删定的版本。故,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清晰的,《唐风·蟋蟀》应是从简本《蟋蟀》改进而来。

#### 四、余论

由上述可知,《耆夜》简文的用语和其所记本事之间的历史语境是非常契合的。而简文中《蟋蟀》这一乐歌的本事相较《唐风·蟋蟀》而言也显得较为合理,其主旨思想和周初周公的思想也比较相符。从后世文人“曲水流觞”故事的角度看,周公即兴创作《蟋蟀》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耆夜》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根据相关研究和笔者分析可知,今本《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标题、乐调、语言、句式、思想和题材上都广泛存在着继承和相互借鉴的习惯。考虑到简本《蟋蟀》与《唐风·蟋蟀》在标题、语言、句式、题材和思想上存在的极大相似性,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比《诗经》中存在的同题诗的关系更加密切,故它们之间应该是源与流的关系。而由于简本《蟋蟀》在行文上更接近口语化,《唐风·蟋蟀》在行文上更为整饬,故简本《蟋蟀》应是未经删改整理之前的版本,而《唐风·蟋蟀》应是后人据简本《蟋蟀》改进而来的。

而通过对简本《蟋蟀》与《唐风·蟋蟀》的梳理和研究,也可以略窥先秦文献传播的崖略。就其本质而言,无论是简本《蟋蟀》还是《唐风·蟋蟀》都应属于先秦文献的范畴。先秦时期,文本的生成往往需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段,受不同的环境影响,其文本所呈现出的状态也是十分不同的,这点从其他出土文献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在《清华简》面世之前,《郭店竹简》《上博简》分别出土了一篇《缁衣》,这两篇《缁衣》和《礼记·缁衣》应为同一篇文献,但是简本《缁衣》和传本《缁衣》在选词用语、典章引用、篇章次序、行文繁简和思想侧重点上却存在非常大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应该是在传播

过程中和后人不断对其整理的过程中造成的,而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缁衣》。这也说明了先秦文献的生成往往是一个漫长而动态的历史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简本《蟋蟀》和《唐风·蟋蟀》的情况与简本《缁衣》和传本《缁衣》的情况非常类似。故无论是放在今本《诗经》中广泛存在的继承与相互借鉴的习惯中考虑,还是放在先秦文献的生成与传播的大背景下考虑,简本《蟋蟀》与《唐风·蟋蟀》都应该被视为源与流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1]李学勤.清华简《归夜》[N].光明日报,2009-08-03(12).
- [2]孙飞燕.《蟋蟀》试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9):11-13.
- [3]陈致.清华简所见古饮至礼及《归夜》中古佚诗试解[J].出土文献(第一辑),2010,(8):15-30.
- [4]李学勤.论清华简《归夜》的《蟋蟀》诗[J].中国文化(第三十三期),2011,(5):7-10.
- [5]程浩.清华简《归夜·蟋蟀》与今本《蟋蟀》关系辨析[EB/OL].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06-10].<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w/1533>.
- [6]吴新勇.清华简《蟋蟀》及其所见周公无逸思想[J].史学月刊,2012,(4):129-131.
- [7]陈民镇.《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兼论清华简《归夜》周公作《蟋蟀》本事[J].中国诗歌研究(第九辑),2013,(9):57-81.
- [8]黄怀信.清华简《蟋蟀》与今本《蟋蟀》对比研究[J].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三辑),2013,(11):242-251.
- [9]高华平,李璇.由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看“六经”在楚国的传播[J].文献,2015,(7):126-139.
- [10]李均明.《蟋蟀》诗主旨辨——由清华简“不喜不乐”谈起[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4,(1):3-6.
- [11]秦云霞.再析两《蟋蟀》之比较研究——清华简《归夜》所引《蟋蟀》与《毛诗正义》本《唐风·蟋蟀》[J].现代汉语(学术综合版),2016,(4):4-5.
- [12]段颖龙.从清华简《归夜》看毛诗《蟋蟀》之成因与《诗经》早期的流传[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80-85.
- [13]刘光胜.清华简《归夜》考论[J].中州学刊,2011,(1):164-170.
- [14]曹建国.论清华简中的《蟋蟀》[J].江汉考古,2011,(2):110-115.
- [15]姜广辉,付赞,邱梦燕.清华简《归夜》为伪作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7):86-94.
- [16]周宝宏.清华简《归夜》没有确证证明为伪作——与姜广辉诸先生商榷[J].中原文化研究,2014,(2):63-67.
- [17]李锐.清华简《归夜》续探[J].中原文化研究,2014,(2):55-62.
- [18]张三夕,邓凯.清华简《蟋蟀》与《唐风·蟋蟀》为同题创作[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90-95.
- [19]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0]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1]江林昌.清华简与先秦诗乐舞传统[J].文艺研究,2013,(4):43-47.
- [22]高华平.论先秦诗歌的基本特点及其演进历程——由楚简文字所作的新探讨[J].学术月刊,2014,(7):100-112.
- [23]马承源.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4]阮元校刻.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5]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26]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7]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三联书店,2001.
- [28]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9]司马迁.史记(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30]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3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3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33]李炳海.《诗经·国风》同名歌诗用相同曲调演唱考[J].文艺研究,2018,(1):51-57.

(责任编辑:刘伏玲)